

万年历谱

鞠德源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万年历谱

鞠德源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万年历谱

鞠德源 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晋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36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1,650册

ISBN 7—203—00278—5

K·19 定价：精 11.15元

序

王立兴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年代学（或曰年历学）问题，习用的解决办法是查检一些兼注公历日期的中历朔闰表，或一些最近二千年间逐日中西历日对照表。

从古到今，能逐日排比“朝代，帝号，年号，年份，月朔干支，日干支”的中国史日，大体不足三千年。再往上推，则帝王纪元“年数”争议未定。有幸的是自殷商就有的干支纪“日”，东汉采用的干支纪“年”，隋唐出现的干支纪“节气月”和“十二辰”，一整套干支纪时制度，延用至今，不断不乱。历代编历本的史官，都一律用干支制度，上推到千百万年前的历元，起算其后的积年和积日，倒也井然有序。

国际通用的所谓公历，即基督教会用的历法，其上元是后来教徒们假设的所谓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在公元1582年10月以前，按儒略历上推往古，在1582年10月以后，改按格勒哥里历下算未来，而不管西方各国历代实际行用的历本如何。由于公历所用这两种历法的各月中天数和置闰日的规律都简单易记，天文学家用它计算积日，历史学家用它排比各国史实，都能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因此，到本世纪初大多数国家陆续采用这一公历，代替本国的地方性历法。

把中国干支纪日的长历，与公历日期的长历，逐年逐日对照起来，好比一条“公制尺度”与“英制尺度”兼备的长尺一样，凡是列在这“对照表”长尺中的史日，其相互对应的中历日期和公历日期，一览便知。如果每一天占尺长3毫米，每年占尺长共 3×365 毫米，约1.1米。如上推五千年，则“对照尺”应总长5500米或五公里半。长尺对照的形式，显然太长而不适用。如剪裁成短尺，贴成册页，装订成书，也就是坊间的一些“中西历日对照表”。这种历表的部头也大，页数很多。

近年来已有个别学者试图在“历日对照表”中探索中西历某些具有周期性的现象，加以利用，绘制出供检索中西历日用的转盘（一日历盘）。只要知道某一特定史日的中历日期和公历日期，将两个转盘的该“史日”点互相对齐，则在该史日前后若干天内的逐日对照表，全可在两个转盘上一览无余。根据不同特性设计出的转盘，形式不同，用法也各异。但其追求的目标则都是想把沉重的大型对照表，化为轻便的薄盘。这项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已看到的李天赐同志的《公元干支纪日纪年速查盘》和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盘》等，就是物证。不过无论是编历谱，或造历盘，都很困难，要求作者历学根底深厚，科研态度谨严，还要颇具巧思，才可获得能供实用的历盘或历谱。

其所以说这项工作是困难的，主要在于：

（一）共和以前帝王纪年文献不足。刘歆又曾私改古史历谱，损夏益周。古史年代尚有待

发掘考订。

(二)春秋各国诸历并行，多数失传。后世每逢割剧局面，历法也是纷乱难稽。

(三)传世的各种《历经》多有讹脱，尚有待校补探究。

(四)史官编历，或有误推，或对新历阳奉阴违，仍遵旧历演算。虽有当时《历经》，不能保证按《历经》复现的，就是当时亦有错的历本。

(五)战乱时官历未能普及，私卖民间小历的朔闰，每有分歧（此例唐宋均曾出现）。

(六)为了占星需要，或为了阿谀奉承，闰月可以挪移，朔日不妨进退。当时不见记载的人为因素，令人不能尽知。

(七)官历分日在夜半，而民间分日在昧爽，下半夜出现的天象纪录日期可差一日。若在朔晦，可差一月。合朔如在下半夜，分日不同，可使下月内日期全错一天。

(八)中国与西洋不但有时区早迟现象，又有分日在正午或在黄昏之别，使中外天象纪录日期，或差一日。

有上述种种困难，即使精研古今中外现存的各种历法，并利用天象纪录来考核史日，从而编制出的最精审的历盘历谱，也不能说将来某一天，考古发掘出的古代某年历本，与此历盘历谱核对，完全若合符节，朔闰干支一天也不差。因此，研制供查检中西历日换算所需要的工具，是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只有愿意为科研服务，任劳任怨的学者才肯干。

从鞠德源同志《序说》中介绍的各种历算资料之丰富，可以看出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希望他的工作成果能得到推广，从而为科研人员提供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将是鞠同志进一步提高其历盘历谱质量的着眼点。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七月

序

李学勤

中国有绵延悠久的历史，有繁多浩瀚的史籍。重视历史，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致有的外国著作把中国人称作“历史的民族”，德国哲人黑格尔就此更有所发挥。讲历史不能离开时间范畴，从而我国年表之学素称发达。很多人将年表追溯到《史记》。《史记》书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其体例实取自前人，如司马迁所述“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史记》兼采众长，遂为史家树立楷模。由此可见，年表之学确是源远流长。

近代学者对古历法及年代学的研究，在许多地方超过前代，不仅依据传世文献，而且对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以及石刻等有关材料，作为深入分析，得出不少新的观点和推论。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一些年表，为接触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案头所必备。正如万国鼎先生《中国历史纪年表》重编叙所说，一部好的年表，是从事研究、教学、历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学科的必要考参，也是文物、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和编辑等方面工作者不能缺少的工具书。

由于中国历史久远，朝代的递嬗，历法的更替，不同文化的影响，都非常繁复。欲求年表丰富完备，能适合各种读者的需要，势必占据大量篇幅。事实上有的年表厚如字典，只能度藏架上，不便于手头携带，反过来，要使年表轻便简明，就不能不减少内容，影响使用的便利。两难如何兼顾，不知费过多少人的心血。

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谱》和《万年历盘》，正是为克服上述难点而创造的。他若干年来潜心于年表之学，吸取前人各项成就，借鉴国内外有关书籍的经验，独辟蹊径，化表为盘，堪称匠心独运。利用旋转的圆盘来驭繁就简，本为我国古代的发明，其原始或可上推到数学家的式盘。《周礼·大史》所云“抱天时”，“天时”便是一种式盘，足见其起源之早。历代不同类的式盘，或用木，或用铜，或用牙制造，曾为罗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过去虽有人试把转盘移用于历法推算，但适用范围都比较小。象《万年历盘》这种包罗宏富，具备多样功能的，实为前所未见。

上面提到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叙，专门讨论到怎样处理共和以前年代的问题。这个问题，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谱》也必然碰到。如该书叙所说，重构上古年代有好多困难，这些困难现在未消除。应当说明，当前通行的共和以前相当公元前若干年的说法，包括夏、商两代的起迄和周代的初元，都只是一种假说。以武王伐纣之年为例，国内外异说多达几十种，还没有那一种为众所公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过分拘泥夏、商等绝对年代，就没有足够的根据。

学术问题的悬而未决，有的由于主观的研究不够，有的因为客观的条件不足。共和以前古史的年代问题，据我看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多年以来，通过很多学者辛勤努力，已使我们朝向问题的解决趋近不少，不过目前依据仍然不够充分，真正的解决还有待时日，特别是希望有新的关键性材料发现。以为问题业已解决，是不对的；以为问题无法解决，不继续努力，也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当然不等于年表这部分必须空白，因为科学是允许并且需要假说的。选取一种今天看来最合理的假说，是适宜的办法，鞠德源同志便是这么做的。

鞠德源同志编制《万年历谱》和《万年历盘》，用了好几年。其间他曾多次以成果见示，使我认识到他为了使用者的方便，竭尽心力，反复试验，终于做到他所说“用最少的纸幅，‘压缩’下五千年的全部历法项目”。这里呈献给大家的，乃是他无数次改进的结果。读者只要按说明亲手试用，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娴熟使用这一工具。这对促进有关学术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前言

中华历法，起源甚古，历代所造历本，共百余部^①，愈修愈密，影响颇为深远。它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研究和利用中华历法的成就和经验，对于发展当代的文化学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法与年代之学，原非编者本业，只是由于偶然的需要，才有此一点偏好。每有余暇，便检读历书、年表，稍有所悟，便“闭门造车”，先后试制了几种简易年表，因属草创，未遑精研细审，不敢轻示于人。一九八二年九月，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旅美，驻足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研究工作之余，浏览了各种历谱、年表及历学年代学论著，因此获益良多，大开眼界。对早先制作的年表又有了重加修改、补充，增广用途的愿望。回国以来，由于忙于其他业务，编制年表的事，时断时续。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受师友的指海和敦促，才决意了此多年之愿，于是分别编成了《万年历盘》和《万年历谱》。兹公诸于世，敬祈博学先辈和广大读者教正。

《万年历盘》与《万年历谱》是查检中西年代及历法的一种简易工具。编者研制它的目的，是企图让它为文史学者、天文学者、考古学者、历法学者的专业需要服务，为大学中学的师生及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历盘》与《历谱》各有所长，既密切相联，互相辅佐，又可单独使用。《历盘》为星盘式，为编者所首创，查检年代范围长于《历谱》。《历谱》为书本式，既有对他书之借鉴和吸收，也有编者之发展与改进，查检年代范围短于《历盘》。两者均按照紧缩密集方法，用最少的纸幅，包容了中华五千年的主要历法项目。使用干支纪日、纪月、纪年和纪时，是中华历法的独特创造。因此，编者特以干支作为《历盘》和《历谱》的“灵魂”，并巧妙利用公元纪年、干支纪年、纪日及干支序数、中历日序和公历日序等周期关系，使之互为条件，相互验证，以求达到一《盘》多用，一《谱》多能，迅速通检之目的。

编制《历盘》与《历谱》，涉及许多古今中外的年代学、历学知识，也涉及历法年代上某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还有年代、历日及其相互换算等问题。因此，编者在《历谱》之前，特编写“序说”一篇，用以说明与本《谱》及《盘》相关的历法知识，而对《历盘》只介绍它的结构与检查方法。

在编制《历谱》与《历盘》的过程中，编者吸取了古今中外历学大师们的年代学和历法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历算格式，采纳了某些新的计算方法。参考的历法年表著作，主要有刘羲叟《长历》，清官藏《历代帝王统系纪年》，齐召南著《历代帝王年表》，叶维庚著《纪元通考》，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史襄哉著《纪元通谱》，薛仲三、欧阳颐

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董作宾著《殷历谱》、《西周历谱》、《中国年历总谱》及《董作宾先生全集》中的全部历法论著。此外，还参考了朱文鑫著《历代日食考》、《天文考古录》，刘宝林著《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日食表》及《日本历日原典》、《天测略历》（昭和53年）、《历法手册》（历计算研究会编）等著作。

本《历谱》公元前的世纪、年代和纪日，悉遵董作宾先生之说；公元后的年代和历法，则依陈垣先生及薛仲三、欧阳颐等先生之说，有所变通之处，则附以简短说明。中国历法，共和以前之年代，一向被视为疑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西周历谱》，是研究古代历法的功力至深之作，《中国年历总谱》是现有年表历谱中尺度最长者。虽然有各家的辨证之说，但这三部大著仍是目前可资遵循参考之历谱。笔者对历学先辈所持之异说，有需说明介绍者，即在《序说》中予以标注，以供读者参考。

①朱文鑫著《历法通志》一书统计为102种，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统计为104种。

目 录

序·····	王立兴(1)
序·····	李学勤(3)
前 言·····	(6)
万年历谱序说·····	(8)
万年历谱 (公元前1384年—公元2100年) ·····	(34)
公历元旦儒略周日表·····	(210)
中国历代纪元谱·····	(217)
蜀魏吴朔闰异同表·····	(224)
陈周隋朔闰异同表·····	(227)
太平天国年历谱·····	(229)
四季雅名表·····	(231)
月名异称表·····	(231)
纪日雅名异称表·····	(232)
《万年历谱》帝号年号索引·····	(237)
后 记·····	(253)

序

王立兴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年代学（或曰年历学）问题，习用的解决办法是查检一些兼注公历日期的中历朔闰表，或一些最近二千年间逐日中西历日对照表。

从古到今，能逐日排比“朝代，帝号，年号，年份，月朔干支，日干支”的中国史日，大体不足三千年。再往上推，则帝王纪元“年数”争议未定。有幸的是自殷商就有的干支纪“日”，东汉采用的干支纪“年”，隋唐出现的干支纪“节气月”和“十二辰”，一整套干支纪时制度，延用至今，不断不乱。历代编历本的史官，都一律用干支制度，上推到千百万年前的历元，起算其后的积年和积日，倒也井然有序。

国际通用的所谓公历，即基督教会用的历法，其上元是后来教徒们假设的所谓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在公元1582年10月以前，按儒略历上推往古，在1582年10月以后，改按格勒哥里历下算未来，而不管西方各国历代实际行用的历本如何。由于公历所用这两种历法的各月中天数和置闰日的规律都简单易记，天文学家用它计算积日，历史学家用它排比各国史实，都能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因此，到本世纪初大多数国家陆续采用这一公历，代替本国的地方性历法。

把中国干支纪日的长历，与公历日期的长历，逐年逐日对照起来，好比一条“公制尺度”与“英制尺度”兼备的长尺一样，凡是列在这“对照表”长尺中的史日，其相互对应的中历日期和公历日期，一览便知。如果每一天占尺长3毫米，每年占尺长共 $3 \times 365 \frac{1}{4}$ 毫米，约1.1米。如上推五千年，则“对照尺”应总长5500米或五公里半。长尺对照的形式，显然太长而不适用。如剪裁成短尺，贴成册页，装订成书，也就是坊间的一些“中西历日对照表”。这种历表的部头也大，页数很多。

近年来已有个别学者试图在“历日对照表”中探索中西历某些具有周期性的现象，加以利用，绘制出供检索中西历日用的转盘（一曰历盘）。只要知道某一特定史日的中历日期和公历日期，将两个转盘的该“史日”点互相对齐，则在该史日前后若干天内的逐日对照表，全可在两个转盘上一览无余。根据不同特性设计出的转盘，形式不同，用法也各异。但其追求的目标则都是想把沉重的大型对照表，化为轻便的薄盘。这项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已看到的李天赐同志的《公元干支纪日纪年速查盘》和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盘》等，就是物证。不过无论是编历谱，或造历盘，都很困难，要求作者历学根底深厚，科研态度谨严，还要颇具巧思，才可获得能供实用的历盘或历谱。

其所以说这项工作是困难的，主要在于：

（一）共和以前帝王纪年文献不足。刘歆又曾私改古史历谱，损夏益周。古史年代尚有待

发掘考订。

(二)春秋各国诸历并行，多数失传。后世每逢割剧局面，历法也是纷乱难稽。

(三)传世的各种《历经》多有讹脱，尚有待校补探究。

(四)史官编历，或有误推，或对新历阳奉阴违，仍遵旧历演算。虽有当时《历经》，不能保证按《历经》复现的，就是当时亦有错的历本。

(五)战乱时官历未能普及，私卖民间小历的朔闰，每有分歧（此例唐宋均曾出现）。

(六)为了占星需要，或为了阿谀奉承，闰月可以挪移，朔日不妨进退。当时不见记载的人为因素，令人不能尽知。

(七)官历分日在夜半，而民间分日在昧爽，下半夜出现的天象纪录日期可差一日。若在朔晦，可差一月。合朔如在下半夜，分日不同，可使下月内日期全错一天。

(八)中国与西洋不但有时区早迟现象，又有分日在正午或在黄昏之别，使中外天象纪录日期，或差一日。

有上述种种困难，即使精研古今中外现存的各种历法，并利用天象纪录来考核史日，从而编制出的最精审的历盘历谱，也不能说将来某一天，考古发掘出的古代某年历本，与此历盘历谱核对，完全若合符节，朔闰干支一天也不差。因此，研制供查检中西历日换算所需要的工具，是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只有愿意为科研服务，任劳任怨的学者才肯干。

从鞠德源同志《序说》中介绍的各种历算资料之丰富，可以看出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希望他的工作成果能得到推广，从而为科研人员提供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将是鞠同志进一步提高其历盘历谱质量的着眼点。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七月

序

李学勤

中国有绵延悠久的历史，有繁多浩瀚的史籍。重视历史，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致有的外国著作把中国人称作“历史的民族”，德国哲人黑格尔就此更有所发挥。讲历史不能离开时间范畴，从而我国年表之学素称发达。很多人将年表追溯到《史记》。《史记》书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其体例实取自前人，如司马迁所述“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史记》兼采众长，遂为史家树立楷模。由此可见，年表之学确是源远流长。

近代学者对古历法及年代学的研究，在许多地方超过前代，不仅依据传世文献，而且对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以及石刻等有关材料，作为深入分析，得出不少新的观点和推论。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一些年表，为接触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案头所必备。正如万国鼎先生《中国历史纪年表》重编叙所说，一部好的年表，是从事研究、教学、历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学科的必要考参，也是文物、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和编辑等方面工作者不能缺少的工具书。

由于中国历史久远，朝代的递嬗，历法的更替，不同文化的影响，都非常繁复。欲求年表丰富完备，能适合各种读者的需要，势必占据大量篇幅。事实上有的年表厚如字典，只能废藏架上，不便于手头携带，反过来，要使年表轻便简明，就不能不减少内容，影响使用的便利。两难如何兼顾，不知费过多少人的心血。

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谱》和《万年历盘》，正是为克服上述难点而创造的。他若干年来潜心于年表之学，吸取前人各项成就，借鉴国内外有关书籍的经验，独辟蹊径，化表为盘，堪称匠心独运。利用旋转的圆盘来驭繁就简，本为我国古代的发明，其原始或可上推到数学家的式盘。《周礼·大史》所云“抱天时”，“天时”便是一种式盘，足见其起源之早。历代不同类的式盘，或用木，或用铜，或用牙制造，曾为罗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过去虽有人试把转盘移用于历法推算，但适用范围都比较小。象《万年历盘》这种包罗宏富，具备多样功能的，实为前所未见。

上面提到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叙，专门讨论到怎样处理共和以前年代的问题。这个问题，鞠德源同志的《万年历谱》也必然碰到。如该书叙所说，重构上古年代有好多困难，这些困难现在未消除。应当说明，当前通行的共和以前相当公元前若干年的说法，包括夏、商两代的起迄和周代的初元，都只是一种假说。以武王伐纣之年为例，国内外异说多达几十种，还没有那一种为众所公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过分拘泥夏、商等绝对年代，就没有足够的根据。

学术问题的悬而未决，有的由于主观的研究不够，有的因为客观的条件不足。共和以前古史的年代问题，据我看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多年以来，通过很多学者辛勤努力，已使我们朝向问题的解决趋近不少，不过目前依据仍然不够充分，真正的解决还有待时日，特别是希望有新的关键性材料发现。以为问题业已解决，是不对的；以为问题无法解决，不继续努力，也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当然不等于年表这部分必须空白，因为科学是允许并且需要假说的。选取一种今天看来最合理的假说，是适宜的办法，鞠德源同志便是这么做的。

鞠德源同志编制《万年历谱》和《万年历盘》，用了好几年。其间他曾多次以成果见示，使我认识到他为了使用者的方便，竭尽心力，反复试验，终于做到他所说“用最少的纸幅，‘压缩’下五千年的全部历法项目”。这里呈献给大家的，乃是他无数次改进的结果。读者只要按说明亲手试用，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娴熟使用这一工具。这对促进有关学术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王立兴(1)
序·····	李学勤(3)
前 言·····	(6)
万年历谱序说·····	(8)
万年历谱(公元前1384年—公元2100年)·····	(34)
公历元旦儒略周日表·····	(210)
中国历代纪元谱·····	(217)
蜀魏吴朔闰异同表·····	(224)
陈周隋朔闰异同表·····	(227)
太平天国年历谱·····	(229)
四季雅名表·····	(231)
月名异称表·····	(231)
纪日雅名异称表·····	(232)
《万年历谱》帝号年号索引·····	(237)
后 记·····	(253)

前言

中华历法，起源甚古，历代所造历本，共百余部^①，愈修愈密，影响颇为深远。它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研究和利用中华历法的成就和经验，对于发展当代的文化学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法与年代之学，原非编者本业，只是由于偶然的需要，才有此一点偏好。每有余暇，便检读历书、年表，稍有所悟，便“闭门造车”，先后试制了几种简易年表，因属草创，未遑精研细审，不敢轻示于人。一九八二年九月，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旅美，驻足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研究工作之余，浏览了各种历谱、年表及历学年代学论著，因此获益良多，大开眼界。对早先制作的年表又有了重加修改、补充，增广用途的愿望。回国以来，由于忙于其他业务，编制年表的事，时断时续。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受师友的指诲和敦促，才决意了此多年之愿，于是分别编成了《万年历盘》和《万年历谱》。兹公诸于世，敬祈博学先辈和广大读者教正。

《万年历盘》与《万年历谱》是查验中西年代及历法的一种简易工具。编者研制它的目的，是企图让它为文史学者、天文学者、考古学者、历法学者的专业需要服务，为大学中学的师生及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历盘》与《历谱》各有所长，既密切相联，互相辅佐，又可单独使用。《历盘》为星盘式，为编者所首创，查检年代范围长于《历谱》。《历谱》为书本式，既有对他书之借鉴和吸收，也有编者之发展与改进，查检年代范围短于《历盘》。两者均按照紧缩密集方法，用最少的纸幅，包容了中华五千年的主要历法项目。使用干支纪日、纪月、纪年和纪时，是中华历法的独特创造。因此，编者特以干支作为《历盘》和《历谱》的“灵魂”，并巧妙利用公元纪年、干支纪年、纪日及干支序数、中历日序和公历日序等周期关系，使之互为条件，相互验证，以求达到一《盘》多用，一《谱》多能，迅速通检之目的。

编制《历盘》与《历谱》，涉及许多古今中外的年代学、历学知识，也涉及历法年代上某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还有年代、历日及其相互换算等问题。因此，编者在《历谱》之前，特编写“序说”一篇，用以说明与本《谱》及《盘》相关的历法知识，而对《历盘》只介绍它的结构与检查方法。

在编制《历谱》与《历盘》的过程中，编者吸取了古今中外历学大师们的年代学和历法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历算格式，采纳了某些新的计算方法。参考的历法年表著作，主要有刘羲叟《长历》，清官藏《历代帝王统系纪年》，齐召南著《历代帝王年表》，叶维庚著《纪元通考》，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史襄哉著《纪元通谱》，薛仲三、欧阳颐

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董作宾著《殷历谱》、《西周历谱》、《中国年历总谱》及《董作宾先生全集》中的全部历法论著。此外，还参考了朱文鑫著《历代日食考》、《天文考古录》，刘宝林著《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日食表》及《日本历日原典》、《天测略历》（昭和53年）、《历法手册》（历计算研究会编）等著作。

本《历谱》公元前的世纪、年代和纪日，悉遵董作宾先生之说；公元后的年代和历法，则依陈垣先生及薛仲三、欧阳颐等先生之说，有所变通之处，则附以简短说明。中国历法，共和以前之年代，一向被视为疑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西周历谱》，是研究古代历法的功力至深之作，《中国年历总谱》是现有年表历谱中尺度最长者。虽然有各家的辨证之说，但这三部大著仍是目前可资遵循参考之历谱。笔者对历学先辈所持之异说，有需说明介绍者，即在《序说》中予以标注，以供读者参考。

①朱文鑫著《历法通志》一书统计为102种，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统计为104种。